

到2020年,城市社区将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

升级“草根”组织壮大社区正能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经纬

说起社区社会组织,真的有点陌生。不过在城市中,人们也发现身边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更多“热心肠”的人被聚合在一起,很多“暖人心”的事不再是偶发事件,这样的城市“组织”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未来城市中又将活跃着哪些身影?



夕阳再晨组织花园路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花之蕾”青少年服务队开展牡丹园文明小屋义诊服务。(资料图片)

日前,民政部下发的《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什么是社区社会组织?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如何?积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管理又将发挥哪些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身份”更清晰

《意见》首次提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挥正能量提供了广阔空间

说到社区社会组织,很多人可能有点陌生。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介绍,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从规范化管理视角,可以把社区社会组织分为正式注册的组织、在街道(乡镇)或社区(村)备案的组织、未注册也未备案的组织,后两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草根’组织。”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耿云介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国亮提出,《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社区发展的新要求,提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作用,标志着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和评价更加积极,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像红旗营尹社区地势偏僻,又是廉租房小区,居民生活单调枯燥,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利用辖区资源,创办了河北省首家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通过引入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探索出一条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民政局副局长李秀菊表示,通过居民群众“点菜”,党委政府“买单”,有效解决了社区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

广东惠州创新“+信用”载体 守信方可畅行

本报记者 郑杨

信用城市怎么建

不久前,伯恩光学有限公司副总裁杨俊光兴奋地到惠州海关接受了高级AEO(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证书,公司由一般信用等级企业上调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这相当于拿到了国际贸易的VIP证,今后我们出口到AEO互认国家地区,可以大大降低查验率,提高通关速度,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拓。”

在刚刚入选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惠州,诚信已成为人们享受各种便利的“通行证”。只要

诚实守信,就可能得到令人惊喜的守信“大礼包”,这令社会上形成了“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浓厚氛围。

这一切,得益于该市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积极创新“+信用”应用路径,建设起了“互联网+信用”中介超市、“二维码+信用”粮油溯源系统、“税银+信用”融资平台、“基层治理+信用”农村社会治理等多元化的应用载体。

“红顶中介”、“中介不中”等问题长期以来影响着中介行业的公信力。惠州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互联网+信用”的中介超市,全流程嵌入信用管

的“草根”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确实非常庞大,但是不得不承认,整体发展良莠不齐,特别是自身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相对不足。利用“互联网+公益创业”思维,2011年,已是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的张佳鑫创立了“夕阳再晨”公益组织,采取“社工+义工”的服务模式,目的是让社区老人跟上信息时代。“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看到,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人员构成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组织人员的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异很大,普遍水平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组织基本的制度化 and 专业化要求。”张佳鑫说。

石国亮认为,“草根”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奉献颇多,发展社会组织的经验较为丰富,但他们对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认知较弱,法治意识较为淡薄。耿云进一步指出,目前,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即便是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成为法人,但一些组织现实中缺乏与社会组织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在理事制度、监督制度、财务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规范性都有待提升。而备案或未登记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制度建设就更为薄弱。

除了人员方面,社会组织的服务还需要配套的场地、资金支持,而不少社区社会组织的筹资和项目承接能力还非常欠缺。受访专家指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植根于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因其成长历程相对短暂,规模和能力相对弱小,其潜在作用和应有地位还没有被各方面充分认可。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以文体类、教育培训类居多,公益类、维权类偏少,在发挥服务于民、服务于社会的建设性功能上还不够薄弱。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在经费、场地等方面对政府过度依赖,导致社区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耿云说。

此外,“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措施呈现碎片化、临时性等特点,尚未形成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完备政策体系。”石国亮说。

“草根”组织蓬勃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正式登记的比例稳步上升、备案组织逐步增多,但从总体看,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那么,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如何?

耿云指出,目前,民政部还没有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专门的统计,北京等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备案查询制度。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根据之前对北京地区的调研,在北京一个处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街道,其下辖各社区社会组织平均数量为6个左右。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这一目标是可行的。”耿云说。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存量的社区社会组织中,小部分达到登记条件的依法办理了登记手续,但也存在大量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无法纳入民政部门登记管理。这些“草根”组织发展迅速,扎根社区,骨干成员大多是本地居民,适宜由街道办(乡镇政府)和社区(村)居委会负责管理。

量变到质变难度可不小

目前城市社区的“草根”社区社会组织数量非常庞大,但大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完备政策体系也尚未形成

石国亮认为,目前扎根城市社区

组织建设也得有“套路”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既需要国家层面的系统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更专业和规范化运作,更需要社会公众的深度认知和参与

针对城市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的诸多问题,耿云认为,要充分认识到社区社会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加强政府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组织培育与孵化、税收减免等相关制度。同时要转变管理方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加强制度建设、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

石国亮认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过去的固定思维中,而应该拓展到信息社会的广阔空间中来。

“基层党委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支持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建议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社区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困难和问题;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工作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同时,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社区发展的总体规划,使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社区的发展。”石国亮说。

“面向基层的社会组织,一定是以百姓需求为出发点,自发自愿的,通过专业的运作和规范化服务成立社会组织,更加持续、高效、高质量地为社区提供服务。”张佳鑫建议,在国家层面,建议配套进行政策理论的宣传倡导,提升社会公众对“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知晓率和认知程度;从区县层面,应小步快走,稳扎稳打,针对老城区、回迁小区、城乡接合区等各类区域实行分批试点,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推出一个。同时,基层社区代表应紧密围绕社区需求,整合社区资源和驻区企业资源,联络社区社工和居委会,逐步从“学习者”“参与者”过渡到“发起者”“组织者”和“运营者”。

有43家粮油企业的142个产品进驻粮油二维码溯源系统,为舌尖上的安全筑起了一道“信用防火墙”。

惠州还将信用应用的触角伸向广阔的农村,探索“基层治理+信用”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目前,各具特色的“信用村”“信用户”已在惠州各县区实现了全覆盖。各地的征信中心共录入农户信息28万多条,认定信用户2.4万多户,贷款户数4632户,金额8.35亿元。这不仅解决了农户融资难问题,还为社会综合治理拓宽了新的路径。如龙山镇推出“争创诚信守法先进户”活动,在惠农助农、科技指导、致富项目、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诚信守法户”多方面倾斜照顾。

惠州市发改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当前,惠州正着力探索“财政资金+信用”的应用新模式,对21项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实行不良信用记录“一票否决”。对于广大市场主体来说,信用报告或信用记录将成为其获得政府部门认可的“通行证”。

城之道

上海的定力

李治国

最近一段时间,一篇名为《上海是怎么错过这些年的互联网机遇的?》文章热传,阅读量很快冲上“10万+”,一时间引起了多方热议。在上海两会会场,也有代表委员提及这篇文章,或附议其中观点,或质疑其中问题。

文章作者认为上海太注重精细化管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讲究野蛮生长,先污染,再治理;先擦边,再洗白,太规矩是做成不事的”。有些地方为了留住大户什么都可以谈,连劳动法都可以商量。这在互联网行业,在上海都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说法其实似是而非。

就消费互联网领域而言,我们不能只看到阿里巴巴,忘记了“钱宝网”;不能只看到腾讯,忘记了“E租宝”。不讲究规则,代价往往异常惨痛,而受害者更多是参与其中的普通群众。注重规则,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更是对百姓利益的尊重。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严管初创企业的“野蛮生长”,或许确实会逼走、“错失”一些破局的“种子”,但这也事不关己,应该坚守的原则,必须要坚守。

上海长久以来秉持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其实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不少创业企业也承认:“全国不少地方的初创氛围不错,但如果壮大了,还是会回到上海。因为一开始需要更多的冒险精神,到最后总希望更多的契约精神”所以,当不少人埋怨上海没留住马云,没培养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时,或许都没注意到,马云其实早已回到上海,并在上海的市场上纵横捭阖,开始更大的发展和布局。

成长坐标

北京

民营博物馆方兴未艾

文/摄 本报记者 翟天雪

一座城市里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度和民众素养。

在北京,近年来非国有博物馆的数量快速增长,不仅填补了馆藏门类空白,也因地域性强、特色鲜明、接地气等特点受到人们喜爱。

目前北京注册博物馆数量达179家,其中非公有博物馆注册数量已近40家,成为全社会共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北京复夏博物馆成立于1996年,以明清传世文物为主,展览侧重开放形式,突出传统文化的亲和力。



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展出的多为流散在海外、被抢救回来的中国珍贵文物,其中圆明园国宝兽首最为引人瞩目。



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是以陶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馆藏文物约2000余件。